

儿童叙事与现实反思

——80年代以来“精神探索”儿童叙事论

王文玲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20012)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儿童叙事作品,主要体现为带有现实责任感的寻根功能,可以称之为精神探索。这表现为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人性的关怀,同时,女性主义写作作为独特的话语,也表达着自我存在的焦虑。

关键词: 儿童叙事;精神探索;“寻根”功能;女性主义写作

中图分类号: I207.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08)01-0085-03

儿童叙事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寻根”,“寻根”的意图有多种,如携带批判的眼光,这时表达的是“精神探索”功能;还有单纯的缅怀过去的意图;展示成长心路的意图等。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儿童叙事,从表现的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如下内容:文革历史反思;现实生存展示;进行自我成长追溯,作家亲历了自我由单纯无知到成人的过程,追溯成长过程,解释自我受压抑的历史;对过去生活的怀旧;带着赞美之心追溯童心的光辉。经考查发现,这诸多类作品中所体现的叙事功能,以“精神探索”最为显著。

本文以上述内容之一——现实生存展示这一类作品为对象,考察其内容,分析其对“精神探索”功能的体现,即其较强的现实批判性。儿童叙事的现实生存展示内容,在1980年以中期以来,以人性书写和女性生存书写两方面较为明显。

一、人性异化

作家在思考人性的问题时,儿童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是不低的。纯洁、向善的儿童特点与人性丑陋是格格不入的,儿童因而往往作为个体整个成长过程中人性尚处洁白的阶段而存在。

在人性书写中,深深的焦灼之感是明显的。孩子回到人之初的纯洁心灵状态之中,与人世的恶形成鲜明的对照,作家大多不选择对儿童的善

性的直接书写,而是让他们向人世行走,展现没有痕迹的心灵被涂写的过程。汪曾祺以平和的姿态书写现实,迟子建以温和的方式对抗现实都被指为缺乏力量:“在汪曾祺笔下,真正的自然就是这么平静、纯净,与世无争的一湾小溪。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自然。暴风骤雨到哪儿去了?这个平静的水乡如果有暴风骤雨,那么汪曾祺该怎么处理?假如明海与小英子的恋爱出现了矛盾,那么汪曾祺该怎么处理?”^[1]

温情的书写比不上直面现实的力度,而大多作家处于直面现实的焦灼之中。如毕飞宇的《那个男孩是我》(1993年)、《写字》(《山花》1996年第9期)、《白夜》(《钟山》1998年第5期),小说先描写人最初心灵一片洁白的时候,然后描写孩子如白纸一样单纯的心灵怎样在遭遇现实人性时轻易地被涂写了,孩子“我”单纯、真诚的心灵被世人的欺骗、嫉恨轻易地伤害了。叶蔚林的《割草的小梅》(《特区文学》1993年第5期)也是出于对现实人性状态的不满而写作,但以张扬善的方式表达这种关怀。“作者叶蔚林谈到,身处改革开放的热浪中,既感受到了它的冲击力,也看到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负面现象;沉渣泛起,腐败丛生,崇金主义导致人情淡薄、人性恶化。由此,浮躁过后渴望宁静,也就有了怀旧情绪,努力回首自己

收稿日期:2007-11-12

作者简介:王文玲(1977-),女,吉林人,吉林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经历中曾有过的美好点滴,人与人之间相濡以沫的温情。^{42]}

艾伟笔下的少年面对众人的欺侮,以自我变异的方式求得强力的获得,选择以暴力拯救自己,但结局是自我的毁灭。《少年杨淇佩着刀》(《花城》1996年第6期)中,杨淇面对同学的欺负给自己配了一把佩刀保护自己,佩刀改变了他受欺侮的地位,但他也因此在一系列事件后被开除。《回故乡之路》(《人民文学》2000年第12期)中,男孩解放面对别人的欺侮,要让自己成为英雄以获得强力,但成为英雄的代价是被炸弹炸断了一条腿。

余华在现实面前要狠狠地打上一拳,他心中现实的真实是一个本相冷酷的现实。作家早期的小说里,死亡、暴力和血腥并不仅仅是一种记忆,而是经由作者的叙述转化而来的世界的真实。余华内心“个人的真实”是对世界暴力性、人性恶性的概括,而不是现实性的书写。作家描写了寻求温暖的心灵进入现实时的遭遇,《十八岁出门远行》(《北京文学》1987年第1期)和《四月三日事件》(《收获》1987年第5期)把叙述的时间点聚焦在儿童期与成人期的交叉点——18岁,在这个临界点上让少年第一次面对冷酷的生存,预示人性阴冷的开端。《戛胆小如鼠》(《东海》1996年第9期)描写男孩“我”要保持本性的存在就会受到嘲笑,然后吃尽苦头。“我”从小比别的孩子更“脆弱”,什么都害怕,怕狗、怕鹅,不敢上树下水、怕死、不和别人打仗、不骂人,害怕暴力。然而,无害于人的天性在现实面前脆弱无力,现实信奉欺软怕硬、弱肉强食的信条,走向异化是“天性的道路”。“戛胆小如鼠”里的三篇作品,讲述的都是少年茫然的经历和内心的成长。那是恐惧、不安和想入非非的历史,也是欲望和天性的道路。这时候,世界最初的图像就像复印机一样,迅速地印在了这些少年的心灵深处,他们的成长就是对这图像的不断修改。“作品揭示了人性被修改的命运与历史。

残雪的一些作品中,儿童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作家不强调笔下儿童的善美之心,而是强调他们没有被涂写过的灵魂特征,这样的灵魂往往具有选择生活道路与价值方向的机会。《狮子》(《收获》2001年第2期)中的男孩泥朱代表人在生命之初的人,他面临欲望和诱惑,但也有机会选择更高尚的生活,然而自身的胆怯使他丧失了这个机会。认识到了人的自我局限性,展现局

限性暴露之时的面貌。因为,或者这种没被改写过的灵魂对生命的真相还存在着——一丝体察力。如《灰空里的蓝光》(《山花》1999年第9期)中只有未进入“秩序”的孩子可以感觉得到父女、姐妹关系中的仇恨。同样的表达出现在更多的作品之中,如《饲养毒蛇的小孩》(《收获》1991年第6期)、《窒息》(《芙蓉》1997年第5期)、《妹妹的安排》(《青年文学》1998年第1期)、《阿娥》(《小说界》2000年第2期)、《翻藕》(《十月》2001年第5期)、《迷失》、《男孩小正》(《花城》2003年第3期)等。

二、女性存在的焦灼

女性主义写作的作品里往往出现对女性幼年成长经历的书写,这种书写带有明显的现实目的性,出于对女性生存处境的焦虑,童年生活都是指向这一目标的。女性历史上的苦难与现实的苦难是相连的,童年的女孩也处于这个链条之中,无法逃脱。

“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43]},回到女性成长中的童年的目的就是展现这个‘形成’的过程,因而带有比较强烈的现实目的性。王安忆的《纪实和虚构》(《收获》1993年第2期)以一个城市人的口吻追溯自我生命的来源,追溯的最初动机在于“我”在现实中的孤立无援。在上海这座城市,“我”是外来户,是随着革命家庭一起进驻城市的,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渊源,自始至终难以被上海真正接纳和认可。铁凝的《午后悬崖》(1997年)以童年的女性之痛对照成年后的女性之痛,显示女性存在的宿命。《玫瑰门》(作家出版社,1989年)中,14岁的小姑娘苏眉寄养在外婆家,她是三代女性经历的目击者,也是受害者。苏眉长大后极力挣脱外婆司猗纹的宿命与纠缠,但发现自己长得越来越像外婆,从姿势到神态,苏眉新生的女儿额角上的一弯新月形疤痕,与司猗纹头上被丈夫毒打的疤痕相似,暗示着女性存在的宿命。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尔雅出版社,1997年5月)以成长展示女性历史与现实的压抑。陈染说:“私人生活”这本书从哲学的层面说正是讨论“个人”的存在与位置,讨论了现代人的内心的疏离感、迷失感和不安全感等等焦虑。^{44]}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花城》1994年第2期)中,童年阶段的生活不是以独立的篇幅存在于作品之中,而是分散在作品的不同部分,它们在需要的时候才被抽取出来,对应当下主人公的行为及观念,童年用

以对当下进行解释,强调童年阶段对当下女性情感、爱欲生成等方面的影响。如写主人公多米在黯淡的大学时代的孤寂,其痕迹来源于孤独的成长经历,来源于她存在于一个不完满的家庭,3岁时死了父亲,而母亲又不是总待在身边。“没有人管我,也没有地方可去。一个人在屋子里感到害怕,只有在床上才感到安全。上床,落下蚊帐,并不是为了睡觉,只是为了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呆着。”王干将1990年代的女性写作分为三种类型:①社会复合型。这以张抗抗、铁凝、王安忆为代表,……她们在强化女性性别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同时,仍然在小说中综合了诸多的社会因素,这使得她们的作品有了较为厚实的历史内涵和人性内涵。②个人秘史型。这以陈染、林白、海男为代表。……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扩大的女性欲望让她们的小小说具有真正的女性主义特征,是女性主义的某种范本。③都市宠儿型。这以卫慧、棉棉、魏微等一批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为代表。^[5]王安忆、铁凝倾向于书写成长的历史内涵,陈染、林白、海男为代表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则展示了女性意识的生成与变化。

对女性自我身体的展示,是女性“私人化写作”确立自己的话语所使用的方式。女性“私人化写作”出现于1990年代,以女性的身体与爱欲成长展现及确立现实的存在权力,又和“躯体写作”、“另类写作”、“美女写作”等名词交叉。女性“私人化写作”具有远离宏大叙事,书写个人生活,展示女性自身体验与本能欲望的特点。新时期之初,女性作家往往倡导作为“少数派”所应有社会价值,表达社会的共同关怀,到了陈染一批人,她们要求完全拆解男权话语控制下的社会意识,拒绝在男女平等口号下女性自我特性的埋没。她们反抗的目的是确立女性特有的话语方式与权力,因而,性别往往成为反抗的方式,女性的身体成为反抗的武器。

女性通过自我身体的展示,书写男权话语中被取消的女性自我的一切。女性自我的张扬包括多方面,如女性自己的故事、性的欲望、女性隐秘、对社会参与权力的渴望等等。但在这里,性与爱是关键的词汇,它们最能显示女性自我的性别特征与需求。这时女性童年成长史作为女性自身的重要部分而浮现在文本之中,童年生活作为女

性性别意识的生成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女性依靠回溯女性成长的历史观察一代女性女性意识的来源、女性苦难的根基。陈染的《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年3月版)、《空心人诞生》(《百花洲》1991年第2期)、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海男的《蝴蝶》(《人民文学》1995年第1期)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作品混合着自传性的特点。

张洁等一代女性作家张扬女性意识,以男女平等为口号,陈染、林白等一代作家从女性本体出发,对男性中心文化进行叛逆、逃离。到了下一代女性作家,19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1970年代生作家,如卫慧、棉棉、周洁茹等,在作品中则少有童年生活的展示,因为更多的是书写自我的狂欢。“以陈染《往事干杯》、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等为代表的为了女性的身体解放而佯狂实癫阶段,它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它以性为突破口,将缭乱的性当成了女性实现身体解放的秘密武器;以棉棉《九个目标的欲望》、卫慧《像卫慧一样疯狂》为代表的为了癫狂而癫狂的阶段,它是女性癫狂写作的极端化,癫狂已经不再是追求‘人性’解放的工具,而是目的本身,是为了追求极限体验、高峰快感。在此,中国女性癫狂写作由追求解放的产物变成了追求放纵的产物,走到了自身的反面。”^[6]

参考文献:

- [1]吴炫.穿越当代“经典”——文化寻根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J].江苏社会科学,2004(1).
- [2]恒学.苦难中的美好——评叶蔚林的中篇小说《割草的小梅》[J].云梦学刊,1994(4).
- [3]潘延.对“成长”的倾注——近年来女性写作的一种描述[J].江苏社会科学,1997(5).
- [4]黄咏梅.重新进入陈染的私人生活[N].羊城晚报,2004-05-08.
- [5]王干.90年代文学论纲(下)[J].南方文坛,2001(2).
- [6]葛红兵.癫狂体验 耻辱意识 市民精神——当下女性写作的三个问题[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2(4).

[责任编辑 张克军]

Children's Narrative vs Reflections upon the Realities

—A Psychological Probe into Children's Narrative Theory since the 1980s

Wang Wenling

(Literary School,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Province 13001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mid-1980s children's narrative works have embodied their root-searching function with their realistic responsibility, which can be called psychological probe. This trend shows these writers' reflections upon history as well as their humane care. Meanwhile, feminist writing as a peculiar discourse also expresses the anxiety of self-existence.

Key words: children's narrative, the 1980s, psychological probe, root-searching function, feminist writing

(上接51页)

个体的行为活动就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规范、一种道德。一旦这种规范、这种道德成为行为判断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时,它就形成了一种有形的“硬性”文化。反过来,这种“硬性”文化会进一步规范和强化个体的行为。即使文化的基础消失了,它也会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动之中,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之中。武士道作为一个独立的伦理的训条也许会消失,但是它的威力大概不会从人间消亡。它的武勇的以及文德的教诲作为体系也许会毁灭,但是它的光辉与阴暗,将会越过这些废墟而长存于世。

参考文献:

[1][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张俊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P15.

[2]李群.武士道与文化侵略——探析近松门左卫门文学中的侵华意识[J].东疆学刊,2005(4).

[3]杨绍先,姜贵书.武士道德雏形——平安主从道德[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4]王志.日本武士道的演变及其理论化[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5][日]古田光.日本思想读本[M].东京:雄山阁,1977,P37.

[6][日]相良亨.武士的思想[M].东京:ペリカン社,1984,P5.

[7]姜贵书.武士道嬗变的历史轨迹[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8]向卿.论江户时代武士道的平民化[J].日本学刊,2004(5).

[责任编辑 张克军]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Japan's Bushido

Li Haitao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Province 133002, China)

Abstract: As a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on in Japan, bushido is initially based on the behavior of the samurai, and gradually develops into a kind of behavioral habit of the samurai stratum. After the samurai becomes a ruling class, the behavioral habit evolves into a kind of conception and spirit. Although the behavioral and spiritual foundation of bushido does not exist nowadays, it still exerts a profound effect on every Japanese by its uniqueness.

Key words: Japan, samurai, bushido, culture